

诗 学： 理论与批评

1996 年卷 · 理论

陈旭光 著

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

百花文艺出版社

诗学： 理论与批评

陈旭光 著

内 容 提 要

本书是青年学者陈旭光的第一本理论著作。书中对当代诗学的理性思考,为进一步构建体系周密的语言诗学奠定了基础;对“朦胧诗”以后青年诗人诗歌创作的全景式扫描,为这一阶段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物。作者学风严谨,观念新颖,表达平实,显示出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颇强的逻辑思辨能力。

诗学:理论与批评

陈旭光 著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天津市张自忠路189号)

天津市宝坻第五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092 毫米 1/32 印张 7.75 插页 4 字数 162000

1996年12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 7-5306-2485-7/I·2220

定价:12.00元

顾 问 冰 心

编审委员会

主 任 袁 鹰

副主任 谢永旺 冯立三

委 员 (按姓氏笔划排列)

白 描 孙玉石 朱向前 朱盛昌
吴思敬 何志云 张 韧 张 锲
张凤珠* 张守仁* 杨匡满 周艾若
高洪波 秦 晋 陶泰忠 崔道怡*
韩瑞亭 雷 达 缪俊杰

(注:*号者为常务编委)

总策划 白亚南 简文乐

出版委员会

主 任 张 锲 梁 衡

副主任 杨牧之 郑法清

委 员 胡毅强 甘以雯 陈爱仪 林 莽
朱晓岭

总 序

袁 鹰

《21 世纪文学之星丛书》前年开始出版 1994 年卷 15 册,去年出版 1995 年卷 12 册,今年继续出版 1996 年卷 12 册,三度芳菲,春光满眼。看到我们的社会主义文学园圃中一簇簇新葩临风摇曳,顾盼多姿,芳香四溢,心头禁不住涌起阵阵欣喜之情。

这套冠以“文学之星”的丛书,是中国作家协会中华文学基金会和百花文艺出版社为了服务文学事业、促进创作繁荣的一项举措,寄希望于新世纪新人,着眼于那些具有文学才华、取得优异成绩而又由于种种原因尚未出版个人专集的青年作者,为他们搭桥铺路,擂鼓助威,采取每年出版一套丛书的方式,堂堂正正地将他们送上文坛。因而,也可以说是一项文学的“希望工程”,一项跨世纪工程。

前两年,冯牧同志和我在为 1994 年、1995 年卷所作序文中,在开端和结束处曾说过这样两段话:

现代文学继承了具有五千年文明的民族悠长丰厚

的文学遗产，顺乎 20 世纪的历史潮流和时代需要，以全新的生命，全新的内涵和全新的文体（无论是小说、散文、诗歌、剧本以至评论）建立起全新的文学。将近 100 年来，经由几代作家挥洒心血，胼手胝足，前赴后继，披荆斩棘，以艰难的实践辛勤浇灌、耕耘、开拓、奉献，文学的万里苍穹中繁星熠熠，云蒸霞蔚，名家辈出，佳作如潮，构成前所未有的世纪辉煌，并且跻身于世界文学之林。八十年代以来，以改革开放为主要标志的历史新时期，推动文学又一次春潮汹涌，骏马奔腾。一大批中青年作家以自己色彩斑斓的新作，为 20 世纪的中国文学画廊最后增添了浓笔重彩的画卷。当此即将告别本世纪跨入新世纪之时，回首百年，不免五味杂陈，万感交集，却也从内心涌起一阵阵欣喜和自豪。我们的文学事业在历经风雨坎坷之后，终于进入呈露无限生机、无穷希望的天地，尽管它的前途未必全是铺满鲜花的康庄大道。

这一批青年作家，同当代不少杰出的青年作家一样，都可能成为 21 世纪文学的启明星，升起在世纪之初。启明星，也就是金星，黎明之前在东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启明星，黄昏时候在西方天空出现时，人们称它为长庚星。两者都是好名字。世人对遥远的天体赋予美好的传说，寄托绮思遐想，但对现实中的星，却是完全可以预期洞见的。

作为本丛书编审委员会的主持人，冯牧同志不幸于去

年秋天离我们远去，给我们留下了不可弥补的损失，也留下一份珍贵的精神财富。他勤勤恳恳全心全意对祖国文学事业的献身品德和培育扶助青年作者的满腔热情，无声地教育和激励着我们继承他留下的编审“文学之星丛书”工作，仍然本着同样的认识，同样的愿望，怀有同样的心情，一如既往，不敢稍有懈怠。

三年以来，不敢说已经推出多少部巨著，巨著将会伴随巨匠诞生在即将到来的新世纪。可以奉告于作者、读者和文学界同行之前的，自接受委托参与编审之日起，我们都是兢兢业业，努力遵循“二为”方向，贯彻“二为”方针，为文学园圃的绚丽繁华贡献绵力，增添一花一叶。每次编审工作前后历时一年，自始至终，都以作品质量为唯一取舍标准。我们高兴地读到一批批贴近时代风云、贴近人民爱憎并且具有各自艺术特色的作品，其中有不少作品先在刊物上发表时就得到好评，为文学界和读者瞩目。他们的作品中，焕发着文学新军共有的英姿朝气。我们也乐于看到一些在创作手法和风格上有所创新、有所尝试的作品，即使这种创新和尝试还处于探索阶段，未臻成熟，那也比固步自封、墨守陈规、吃别人嚼过的馍要好得多，毕竟，21世纪的文学属于开拓的崭新的文学。1996年卷的12册，中短篇小说、散文、诗歌、儿童文学和评论，在这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突破，确是新的、可喜的收获。

我还想顺便介绍一下编审工作。我们编审委员会成员来自四面八方，平时分散读作品，分组交换意见，每年只在终审时集中几天，反复讨论。炎暑之际，虽然远避尘嚣，情绪却一样灼热，直到最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顺利决定了入选

书目,大家才顿时感到一阵轻松和清凉。审读的程序力求做到严肃和严格。比如,从初审开始,就隐去作者姓名、实行“闭卷式”审读,二审、三审都在只看作品不问作者的情况下进行,直到集中终审时,才现出庐山真面目。可能有人认为似乎多此一举,但我们的目的还是为了力求避免和排除某些时俗不良风气的干扰,减少不必要的心理负担,使编审工作比较安宁纯净的气氛中顺利进行。又比如,个别书稿正在顺利通过初审二审进入终审时,突然获悉作者已有或者即将有另一部新作问世,为了严格按章程中“出版第一本书”的规定办事,不得不忍痛割爱,因而也不止一次经受一种不免惋惜却又无可奈何的惆怅。这种做法,这种心情,我们自己甘苦自知,当能得到有关当事人所谅解和期待入选的作者们所赞许吧。

三年转眼过去了。本丛书再出版三卷,我们就将走到21世纪的大门口,就将聆听到新世纪那震撼心灵的钟声。每念及此,不觉心绪如潮,难以言宣,同时也就分外感到肩头的沉重,再次想到任重道远、上下求索的古训。

1996年大暑之日

序

吴思敬

在当今这个社会，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的事业。但偏偏就有一些人为了诗，为了在自己心灵中保存一块净土，为了在国人心中播种一颗良善而美好的诗的种子，而在寂寞中坚执着。陈旭光就是我们这个时代不多的甘于寂寞的年轻人。他从大学本科阶段就开始关注诗，研究诗，到北大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更以诗歌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几年之间，辛勤耕耘，成果不凡。现在他把自己关于当代诗歌的系列论文汇集在一起，编成《诗学：理论与批评》一书，被《21世纪文学之星丛书》编委会通过出版。作为他的同行和朋友，我由衷地为他高兴，也为诗歌理论界又有新人崭露头角而欣慰。

我国搞诗论的人，大致有两种类型，一类侧重搞诗歌理论，一类侧重搞诗歌批评。这就好比科学研究，一些人搞基础科学研究，一些人搞应用科学研究，术业有专攻，自然较易出成果。不过在诗歌研究领域这种分工太严细了反而会产生副作用。长期关在屋子里搞纯理论研究，不结合创作实际，往往使理论越玩越玄，成为孤芳自赏的东西，丧失理论的生命力；每天从早到晚地读诗评诗，不从根本上提高自己的理论素养，恐怕也很难评到点子上，以其昏昏，自然不会

使人昭昭。陈旭光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他不愿当瘸腿的诗论家,从开始从事诗歌评论工作以来,他便一手抓理论,一手抓批评,理论与批评并重,从而使他的理论文章建筑在对诗歌现象考察的基础上,批评文章则闪烁着理论的光辉。

收在《诗学理论建设》一辑中的文章,集中反映了陈旭光对当代诗学的理性思考。陈旭光的这些理论文章,还不能说已建立了他个人的完整的诗歌理论体系,但是却向我们展示了他正在构建的诗学体系的蓝图,也许他这一尚未完全成型的体系可以称之为语言诗学。进入80年代中期以后,在我国青年诗歌创作领域和诗论界出现了一股“语言觉醒”的潮流,这股潮流在很大程度上是西方20世纪诗学“语言学转向”启示与刺激的结果。把语言分成科学语言和诗性语言,是20世纪西方诗论家相当普遍的看法。卡西尔认为,人发现了一系列科学语言,但人也为这一成果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如果我们还想保存和恢复那种直接地、直觉地把握世界的方法,就要通过艺术来加以实施。诗性语言是一种艺术语言,它充满着形象和特定的情感,具有隐喻的特征,而在人类文化的早期,语言的这种诗意的或隐喻的特征似乎比逻辑的或推理的特征更占优势,因而他的结论是,“诗是人类的母语”(《语言与艺术》)。海德格尔则强调语言与人的生存之间的密切关系,提出言说是人的本性,人是能言说的生命存在。而诗是本质上的语言,是言说存在的最纯粹的方式,它最少概念化、工具化的框限,是非功利性的。而所有艺术(无论是建筑、绘画、雕塑还是音乐)从其本质上讲都是诗。卡西尔与海德格尔的看法在西方有相当大的影响。20世纪的西方主要诗学流派,诸如俄国形式主义、英美新批

评、结构主义、符号学、阐释学、现象学、存在主义、解构主义等,尽管理论主张不同,但都对语言问题表示了极大的热情。至于我国诗歌理论界近年出现的语言论转向,除去受西方 20 世纪诗学的影响外,更深刻的原因恐怕还要到新诗诞生 80 年来所陷入的困窘状态中去寻找。陈旭光关于诗学理论建设的有关论文,不仅探析了西方 20 世纪诗学“语言学转向”的思想,而更重要的是立足于汉语的语言本位,以语言为中心,从诗歌的本体论、创作论、阅读接受论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诗歌观,为下一步构建体系周密的语言诗学奠定了基础。

收在《诗歌现象研究》、《“后朦胧诗”系列论》中的文章,对“朦胧诗”以后的青年诗人的创作做了全景式的扫描,揭示了由“朦胧诗”到“后朦胧诗”的“后现代”转型,体现了陈旭光在诗歌批评领域所达到的广度与高度。陈旭光选择了“朦胧诗”以后的青年诗歌创作作为自己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并非偶然的。我一向以为,对“朦胧诗”与“后朦胧诗”缺乏理解与感悟,与其说是艺术手法方面的隔膜,不如说是生活阅历、知识结构、艺术经验的不同而造成的思想感情方面的难于沟通。陈旭光作为“朦胧诗”人的小弟弟,“后朦胧诗”人的同龄人,比起老年和中年的批评家,对于“朦胧诗”以后的青年诗人显然有更为浓厚的兴趣、更为深刻的理解。“后朦胧诗”的重要流派与群落,诸如“他们”、“生活流”、“非非主义”、“莽汉主义”、“史诗派”、“寻根派”、“女性诗歌”等,在陈旭光的文章中均有较充分而客观的评述。作者在写作中体现了一种可贵的“史识”,即不是就事论事地进行现象式的记录,而是力求站在新诗 80 年的发展历史与世纪末文化转

型构成的冲击面前，为“后朦胧诗”的创作进行科学的定位。这些系列论文虽然还不能构成诗歌史，但是却为今后的这一阶段诗歌史的写作提供了可靠的参照物。

这些年来，我读某些青年先进的学术文章，一方面对他们锐意求新的勇气表示赞赏，另一方面也对他们大搞名词轰炸，绕口令式的表达感到头痛。读陈旭光的这部书稿，我却感到轻松得多。陈旭光站在当代诗学发展的前列，就他所涉及的论题与论述的对象而言，也算够新潮的了。但他不同于某些盲目求新炫异的论者，而是观念求新，表达求平实，学风求谨严。他以新时期诗歌创作与批评的丰富的材料为依托，借鉴西方现代文论的成果，从文化社会学、审美心理学、接受美学等角度，对新时期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现状进行了实事求是的分析，显示了严谨的治学态度、扎实的理论根柢与颇强的逻辑思辨能力。无庸讳言，书中自有青年学者难免的某些稚嫩之处。至于由于对新时期以来整体文学形势与诗歌走向的基本估价的不同，作者在书中的某些提法，在诗歌界与理论界也可能会引起不同意见的商榷，果能出现这种情况，那倒说明了这本书的价值所在了。

1996年7月13日于北京芳草地

目 录

序	吴思敬(1)
---------	--------

导言 现代诗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1)
-------------------------	-----

第一编 诗学理论建设

走向语言本体的诗歌美学

——当前诗歌语言美学研究的反思和构想	(6)
--------------------------	-----

论当代诗学理论建设的“语言论转向”	(22)
-------------------------	------

诗歌语言:意象符号与文本结构

——从诗歌语言角度对诗歌文本的一种欣赏探奥	(42)
-----------------------------	------

本体观念:诗是一个意象符号系统

——兼论吴晓《意象符号与情感空间——诗学新解》	(54)
----------------------------------	------

诗歌的读者阅读接受:阐释与探奥	(64)
-----------------------	------

第二编 诗歌现象研究

现代史诗:自我意识与传统文化的融合	(78)
论新时期诗歌十年中的“史诗性”倾向	(84)
“新生活诗潮”:其发展及面临的问题	(105)
“女性诗歌”:从“黑夜”走向“白昼”	(120)
“第三代诗歌”与“后现代主义”	(136)

第三编 “后朦胧诗”系列论

文化转型的诗性隐喻:从“崛起”到“崩溃” ——“后朦胧诗”转型论之一	(153)
主体、自我和作为话语的象征 ——“后朦胧诗”转型论之二	(166)
语言的觉醒 ——“后朦胧诗”转型论之三	(187)
意象的沉浮 ——“后朦胧诗”转型论之四	(206)
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转型与诗歌抒情 ——“后朦胧诗”转型论之五	(217)
责编赘语	(236)

导言 现代诗学：理论建设与批评实践

韦勒克、沃伦曾在他们合著的《文学理论》中主张，“在文学‘本体’的研究范围内，对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三者加以区别”。在他们看来，“文学理论”是“对文学的原理、文学的范畴和判断标准等类问题的研究”，“文学批评”或“文学史”则“研究具体的文学艺术作品”。当然，这各有侧重的三者从根本上又是互相联系和互为依托的。因为，“文学理论如果不植根于具体文学作品的研究是不可能的。文学的准则、范畴和技巧都不能‘凭空’产生。可是，反过来说，没有一套课题，一系列概念，一些可资参考的论点和一些抽象的概括，文学批评和文学史的编写也是无法进行的。”^①

显而易见，中国现代新诗的理论批评也可区分为侧重纯理论探讨的诗学研究，侧重当下具体诗人诗作的批评实践及进行历史总结的诗史写作这样三大块。毫无疑问，新诗理论批评的繁荣需要此三者的“通力合作”、齐头并进。

进入新时期以来，伴随着“朦胧诗”的“崛起”，进而修复

^①·(美)雷·韦勒克、奥·沃伦《文学理论》，三联书店，1984年，第31—32页。

并承接起一度中断和衰颓的 20 世纪中国现代新诗的传统，与之荣辱与共的新诗理论批评也焕发了巨大的生机。新时期以来的新诗理论建设已逐步由外部批评走向内部批评，初步实现了诗歌本体意义上的回归。无论是诗学理论，还是诗歌批评和诗史写作均有了长足的“本体”意义上的进步。

然而，无庸讳言的是，危机与生机并存，问题与成绩同在。对于近几年的诗歌理论批评，不满的呼声似乎更高。这表现在有的诗歌理论批评“缺少严格认真的艺术分析和审美感受，或大搞新名词轰炸，或哗众取宠自我标榜，或生搬硬套食洋不化，对于诗坛的种种急功近利的做法盲目趋从，丧失了独立的批评意识和品性”^①。如果说这只是对 80 年代中后期诗论界状况的批评，那么，在进入 90 年代适逢文化转型和商品经济的大潮，诗歌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困境，面临着诗人身份、诗歌大众传播、诗的存在本身等各种各样的危机的今天，新诗理论建设的艰窘更是可想而知了。然而，新诗本身 70 余年从无到有，从幼稚到成熟、深化的艰难发展历程却又期待和呼唤着“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因为，“新诗具有它的独立形态之后的当务之急便是形成一套与这一种新的形态相适应的诗学建构”，“这已成为新诗存亡荣衰的不可分离的策略”^②。显然，横在一代诗歌理论批评者面前的新诗理论批评，既是庄严的历史使命，更是严峻艰难的课题。

① 吴晓、陈旭光《近几年诗歌理论问题述评》，《当代文学研究资料与信息》，1989 年第 11—12 期。

② 谢冕《从诗体革命到诗学革命》，《诗探索》，1994 年第 1 期（复刊号）。

当我在整理蹒跚学步近 10 年来有关诗歌理论批评的论文时,我发现我的论文也大致在诗学理论、诗歌批评及诗史写作三种向度上展开。因而,我把它们敝帚自珍地集辑为《诗学理论建设》、《诗歌现象研究》、《“后朦胧诗”系列论》三部分。这种大致的对应与“契合”自然与我一直以来对新诗理论批评的某些思考直接或间接有关。

《诗学理论建设》的一个中心是语言问题。我向来认为,“语言意识的自觉和强化”或者说诗学理论建设中的“语言本体论”趋向,既受启发于西方现代哲学、美学、语言学等文化思潮,更是诗歌创作实际所凸显出来的“语言的困境”的直接现实。这也可以理解为屡屡超逾既定成规的诗歌创作对先天不足的新诗理论建设的一次逆向推动。以语言为中心,吸收现代西方阐释学、接受美学、阅读现象学、形式主义文论等理论学派的有益营养,探索并大胆建构一种从方法论始,到本体论终,涉及并包含了创作论、鉴赏接受论、主体论等各个理论环节或层次的整体性的“新诗语言美学”,正是这一辑论文的一个主要的理论“视界”。

《诗歌现象研究》主要以“朦胧诗”落潮以后风起云涌、多元共生的诗坛之重要诗歌现象或诗歌流派为对象。从作为“朦胧诗”自身的生发的“史诗性”倾向,经乘“朦胧诗”之虚而入的“过渡性”的“南方生活流诗”,到对“朦胧诗”进行决绝的反动,构成了鲜明反差的“第三代”诗歌和“女性诗歌”等,通过对它们所作的纵向上的追踪溯源和横向上的社会文化的、美学精神的、艺术形式的等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我希望能构成“朦胧诗”以后诗歌发展变迁的某种“史”的轨迹。